**贸易相互依赖中的第三方与国际冲突\***

**摘要：**既有研究主要关注两国间的贸易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的关系，而对第三方的研究尚不充分。文章借鉴相关研究提出机会成本、互动交流和外部性三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表明与第三方的贸易关系及互动交流越密切，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小。然而，外部性具有异质性，只有在贸易关系比较紧密的集团中，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才会更低。同时，文章以欧盟与伊朗核协议签订、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善处理南海争端以及印尼与新加坡调停柏威夏寺冲突为例，发现在机会成本和互动交流机制的作用下使欧盟成功推动美伊核谈；在贸易关系密切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内，南海争端各方在自贸区其他成员国的介入下避免了冲突恶化乃至失控；在贸易关系松散的东盟经济共同体内，共同体其他成员在泰国与柬埔寨冲突调停中并未有效调停双方的领土争端。文章拓展了贸易和平论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化对间接关系的重要作用及其作用机制的认识，从而为国际冲突的预防和解决提供启示。

**关键词：**贸易和平论；第三方；机会成本；互动交流；外部性

**作者简介：**李兵，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1. **问题提出**
2. **文献评述**
3. **理论假设**

**H*1*:  
H*2*:**

1. **研究设计、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2. **自变量**
3. **因变量**
4. **中介变量**
5. **结论**
6. **总结**

**一、问题的提出**

贸易相互依赖究竟抑制还是加剧国际冲突？这是一个经典且富有争议的问题。自埃默里克·克吕塞（Emeric Cruce）提出这一理论至今，一代又一代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致力于探究这一问题。然而，学界至今仍尚未就贸易和平论的论断达成共识。尽管大多数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都证实贸易相互依赖的确有助于抑制国际冲突，但仍有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贸易和平论的怀疑者合理地指出，如果该理论正确，那么为什么一战和二战依然随着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强而爆发？

虽然学界对贸易和平论的研究兴趣居高不下，但是大部分研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联系深度复杂化，贸易相互依赖并非仅仅发生在两国之间，第三方在贸易关系中的角色日益重要。例如，21世纪以来中国的钢铁产业迅速发展，对铁矿石的需求急剧增多。澳大利亚凭借其铁矿石储量最多的优势，形成了对华铁矿石贸易的“卖方市场”局面。但是这一“卖方市场”并非仅由澳大利亚主宰，巴西在中澳铁矿石贸易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淡水河谷、必和必拓以及力拓三大公司合谋，共同导致铁矿石出口垄断和价格虚高。基于这种重要且广泛的现象与趋势，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贸易相互依赖中的第三方是如何引起/抑制国际冲突的？

**二、既有研究回顾**

对于贸易和平论的研究已较成熟，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既有文献可以分为三类，其中大多数研究认为贸易相互依赖能够抑制国际冲突。同时，一些研究提出贸易相互依赖需要与政体或乐观的心理预期等因素结合才能减少国际冲突。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观察到贸易相互依赖有可能抑制国际冲突，也有可能加剧冲突，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经济联系的本质和背景、贸易弹性以及退出成本等。

首先，在贸易相互依赖抑制国际冲突的文献中，很多研究都通过建立统计模型并搜集相关数据，以证实贸易和平论的主张。早在1980年，所罗门·波洛契克（Solomon Polachek）指出贸易相互依赖会提高两国冲突的成本，进而降低双方冲突的水平。为此，波洛契克将四个独立的数据源融合，建立了30个国家长达10年的截面数据模型，结果发现如果两国平均贸易额翻倍，那么它们交战的概率会下降20%。[[1]](#footnote-1)作者运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可靠性。约翰·奥尼尔（John R. Oneal）和布鲁斯·拉塞特（Bruce M. Russet）采用双边贸易和GDP之比测度贸易依赖，贸易依赖程度的低值即为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同时他们还以贸易总额与GDP之比作为贸易开放性的测度标准。通过实证检验，他们发现贸易相互依赖以及经济开放性均与国际冲突的发生呈反向关系。[[2]](#footnote-2)奥尼尔和拉塞特对贸易相互依赖的测度被此后的研究广泛借鉴，遗憾的是他们忽视了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双向因果关系。为此，他们与哈瓦德·赫格（Håvard Hegre）合作，借鉴贸易引力模型估计贸易与和平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贸易的确有助于推动和平，而冲突则使商业往来暂时受挫。[[3]](#footnote-3)

其次，条件性贸易和平论者虽然认可贸易的和平效应，但是对其施加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奥尼尔和拉塞特在研究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也考察了政体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他们注意到民主国家交战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而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容易产生冲突。[[4]](#footnote-4)此后，一些研究同样强调民主制度在贸易和平论中的重要作用。[[5]](#footnote-5)有些研究强调未来的贸易预期。例如，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认为高度的贸易依赖并不能阻止战争，只有高度的贸易依赖加上对未来贸易的乐观预期才能创造贸易的高预期值，进而才能增强双方的和平倾向。[[6]](#footnote-6)他还进一步阐述了贸易预期理论的因果机制：Y的经济依赖和未来贸易预期决定了它对安全形势的评估，进而决定了Y的行为，从而影响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其中Y的经济依赖由塑造该国经济需求的因果要素决定；Y的未来贸易预期由塑造总体商业环境的全部因果要素以及它的贸易伙伴X对该国的贸易政策决定，X对Y的贸易政策产生自塑造它与Y进行贸易的意愿的特殊要素以及它对Y行为的评估。[[7]](#footnote-7)另一些研究强调集团的影响。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D. Mansfield）和乔恩·佩夫豪斯（Jon C. Pevehouse）指出同一特惠贸易协定内的成员之间更少发生冲突，随着贸易流量的增长，特惠贸易协定内各国之间的敌意要小得多。[[8]](#footnote-8)

最后，还有一些研究指出，需要对贸易相互依赖进行更加详细的类型划分，不同类型的贸易相互依赖对国际冲突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凯瑟琳·巴比里（Katherine Barbieri）认为必须考虑经济联系的本质和背景。作者实证检验了1870-1938年270场国际军事冲突和14场战争，发现经济联系对国际冲突有影响，但是其对战争的影响并不显著。事实上，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会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虽然对称的贸易关系有助于促进和平，但是其对冲突的抑制作用会随着国家间联系的拓宽而被抵消。[[9]](#footnote-9)巴比里首先定义了贸易的敏感性和对称性，并以其乘积作为相互依赖的测度方法。巴比里对相互依赖的测度使用了一种异于奥尼尔和拉塞特测度的另一种测度方法。[[10]](#footnote-10)波洛契克和朱迪斯·麦克唐纳德（Judith McDonald）主张，一国与目标国贸易需求和供给弹性越小，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低。[[11]](#footnote-11)这表明战略性相互依赖相较于非战略性相互依赖更有助于抑制冲突。此外，佩夫豪斯从国际冲突的测量角度，提出采用事件数据能够更好地检验相互依赖理论。最终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对双方合作的作用有限，贸易依赖的增强可能会激化冲突，但却能够限制冲突的重复发生。[[12]](#footnote-12)马克·克里森泽（Mark Crescenzi）提出了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的退出成本模型，他通过求解发现当退出成本超过其中至少一国的承受界限时，退出威胁就是一种可行但效果有限的讨价还价手段。如果超出一国承受范围，该国倾向于采用经济和外交手段应对对方的退出威胁，从而增加低级别冲突爆发的风险。但与此同时，随着国家采用更有效的方式解决冲突，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可能性会降低。[[13]](#footnote-13)

然而，关于贸易相互依赖中的第三方与国际冲突的研究则稍显不足。弗雷德里克·陈（Frederick R. Chen）指出与潜在目标国的盟国进行贸易会推动和平，因为一旦挑战国军事介入，其盟国就可能减少与挑战国的贸易，对其实施军事制裁，削弱其寻找替代市场的能力，实证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假设。[[14]](#footnote-14)常元清（Yuan-Ching Chang）通过数理推导提出两个假设：如果行为体与目标国友好的第三国的贸易增加，那么该行为体与目标国的冲突将会降低；如果行为体与目标国敌对的第三国贸易的增加，那么该行为体与目标国的冲突将会增加。研究结果支持这种假设。[[15]](#footnote-15)不过，以上两项研究并未明确考察第三方的作用机制。布兰登·金恩比较了可信信号（credible signaling）和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机制在第三方与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可信信号机制引入了外部行为体可能介入的事后信息，从而改变发起国对战争的预期成本，进而降低其使用武力的概率。机会成本机制假设贸易会降低潜在国家挑起冲突的事前决心从而减少冲突。研究结果表明高昂信号会大幅降低冲突的发生，而机会成本的作用并不确定（indeterminant）。[[16]](#footnote-16)

虽然实证结果更支持可信信号机制，但是汉·多鲁森（Han Dorussen）和休·沃德（Hugh Ward）认为可信信号强调的是对第三方的相对依赖而不是相互依赖程度，同时“信号”终究依赖贸易的机会成本。[[17]](#footnote-17)他们将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间接连接和嵌入性等概念引入到贸易与冲突议题的分析中，发现贸易网络中的直接和间接连接的确具有缓和国际冲突的作用。随着全球贸易网络越来越紧密，与第三国的间接连接的重要性下降，但是贸易网络中嵌入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18]](#footnote-18)多鲁森和沃德的研究强调贸易关系能够强化贸易网络中各方的交流与相互理解，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冲突的发生。虽然他们的研究从网络视角深化了贸易和平论的研究，但是互动交流机制并非是第三方抑制国际冲突的唯一路径，还需要寻找更多的因果机制才能更充分地解释第三方对国际冲突中的作用。

约纳坦·卢普（Yonatan Lupu）和文森特·特拉格（Vincent A. Traag）使用战斗机制（the combatant mechanism）和非战斗机制（the noncombatant mechanism），借助社会网络分析中模块度的概念证实了贸易共同体中的成员无论是否存在贸易关系，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更低。[[19]](#footnote-19)尽管实证结果证实了同一个贸易集团中成员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低，但是由于作者仅提出了一个主要假设，因此并不清楚两个机制是否都在发挥作用。此外，他们还发现，作为控制变量之一的最大流变量并不显著，这与此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第三方在贸易关系与国际冲突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够系统完整，同时也缺少对新世纪以来贸易网络的考察。其次，贸易集团并非整体一块，其规模和成员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并不一致，因此需要更加详细地考察。基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最大流（maxflow）算法和K-means聚类，系统考察2000-2014年相互依赖中的第三方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机制。

**三、核心概念和研究假设**

在国际关系的社会网络研究中，第三方概念得到了广泛使用，然而大多数研究并未清晰地界定第三方，导致这方面研究存在一些混乱。[[20]](#footnote-20)例如，常元清（Yuan-Ching Chang）研究的第三方是与目标国敌对或友好的国家，换言之，只要与两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存在关系就可以视为第三方。[[21]](#footnote-21)更多的研究则将与两国同时有贸易关系的国家视作第三方。[[22]](#footnote-22)与此同时，第三方网络也未得到清楚地阐释，[雷纳托·科贝塔](https://www.bing.com/ck/a?!&&p=af8e8d1b08772300JmltdHM9MTY2MDAwMzIwMCZpZ3VpZD0yZjUyODE0Zi1mYjBmLTY0YmEtMjBjZS05MTAzZmYwZjY2M2MmaW5zaWQ9NTE1Mw&ptn=3&hsh=3&fclid=2f52814f-fb0f-64ba-20ce-9103ff0f663c&u=a1aHR0cHM6Ly93d3cudWFiLmVkdS9jYXMvcHNwYS9wZW9wbGUvZmFjdWx0eS9yZW5hdG8tY29yYmV0dGE&ntb=1)（Renato Corbetta）则清晰地定义了第三方。他认为有两种类型的第三方网络：一种是支持或反对冲突一方的第三方实际干预所产生的网络；另一种是第三方与冲突一方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网络，这种网络可能会塑造第三方作出干预的决定。[[23]](#footnote-23)

本研究中的第三方特指与贸易双方都存在关系的第三国，它会影响两国间的关系，也会受到两国关系变化的影响。第三方网络是由众多第三方贸易国形成的关系集（relational sets）。本文之所以将与两国同时存在关系的国家定义为第三方，是与我们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视角密切相关的。常元清的研究侧重于探究“朋友的朋友”和“朋友的敌人”对两国关系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作用于关系中的一方，进而对整个关系产生作用。本文则试图直接研究第三方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因此对第三方作以上定义。此外，本文定义的第三方网络并非第三方直接干预或介入国际冲突所形成的冲突网络，这意味着研究的重点是关注第三方对国际冲突施加的作用。相反，本文旨在讨论第三方的存在如何改变贸易中其他两方的行为模式，进而使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或降低。

在贸易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的研究中，机会成本机制是最常被讨论的机制之一。机会成本机制的作用方式有三种：第一，由于贸易往来使两国都能从中获益，冲突及其威胁将会破坏正常的贸易模式，这种潜在的大规模的经济成本会阻止存在贸易往来的国家以武力解决政治冲突。[[24]](#footnote-24)其次，由于贸易使国内经济更加专业化，而冲突的发生不仅会切断贸易，而且迫使经济资源重新分配，或者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因此冲突的机会成本还取决于经济资源的转化性以及寻求新的贸易伙伴的可能性。[[25]](#footnote-25)最后，贸易的增加会使商品进口价格降低，进而使国内的生产减少，并在当前商品价格下使稀缺资源用于经济的其他领域。当要素价格调整以维持充分就业时，稀缺要素的回报比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得更严重，同时丰裕要素的回报比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加得更多。[[26]](#footnote-26)而一旦战争造成贸易中断，稀缺资源就难以用于其他急需领域。

事实上，机会成本不仅作用于贸易相互依赖的双方，也对贸易关系中的第三方有重要影响。如果两国发生冲突，其影响不仅局限于双方，而且很有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对广大的第三方的贸易造成消极影响。正因为如此，即使两国不存在直接的贸易关系，它们仍然有动机避免战争对其贸易造成的潜在伤害。冲突的机会成本对第三方的作用方式与其对冲突双方的作用方式类似：冲突有可能中断第三方对交战国的进口供应,从而进一步影响产品供应链；冲突也有可能导致第三方对交战国出口产品的需求减少；交战国还有可能减少甚至切断出口，以便将资源用于战时生产。[[27]](#footnote-27)

图1展示了机会成本机制对贸易关系中第三方的作用方式[[28]](#footnote-28)，其中A、B都与C有贸易往来，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贸易关系。在以上图示中，1a和1b讨论的是A、B的机会成本，1c则是指C的机会成本。在1a中，假设C从A、B进口互补性产品，将其组装后以用作出口。如果A、B发生冲突，C国进口的减少将对其加工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同时，由于A、B为C提供互补性产品，冲突不仅会影响冲突双方的贸易关系，同时也可能使C减少对双方产品的进口。如此一来，A、B的冲突将因第三方的存在而增加冲突双方的机会成本，从而迫使它们尽量避免相互冲突。在1b中，假设C从A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将其出口给B。冲突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供应链，也会干扰冲突双方与第三方的贸易往来，从而使它们的机会成本增加。在1c中，假设C从A和B进口相同的产品。如果A和B发生冲突它们很有可能将原来用于出口的资源用作武器生产，从而使C不得不调动稀缺资源自行生产，或者寻找新的进口来源，这无疑会增加其机会成本。因此，C具备干预及调停冲突的动机。同时，通过阻止A与B的冲突，C也能维持其在买方市场中的优势地位，以便以较低价格进口A和B的产品。

图1 三方贸易中的机会成本机制

C

C

C

A

B

B

A

B

A

a 互补性进口 b 供应链 c 竞争性进口

资料来源： 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A.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1011-1042.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如果两个行为体与第三方的贸易联系越密切，它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小。

与机会成本机制相似，互动交流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互动交流机制主要聚焦于贸易如何增强不同社会类型间的互动与交流。例如，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自由贸易不仅能让贸易国相互受益，而且通过利益和交往的共同纽带将整个文明世界的整个社会联系起来。[[29]](#footnote-29)卡尔·多伊奇等人（Karl Deutsch）也指出，贸易可以在不同社会间建立更广泛的世界性认同，它代替了易引发军事冲突的国家忠诚及政府间的竞争关系。[[30]](#footnote-30)奥尼尔和拉塞特指出，贸易和对外投资是超越特定商业交往的更为广泛的交流媒介，这些交流会形成一种潜在的避免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渠道。[[31]](#footnote-31)伊万·哈里森（Ewan Harrison）指出，自由主义认为如果一国的战略偏好较为良善，透明性有助于增进国家间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集体身份和团结，[[32]](#footnote-32)进而能够缓解彼此之间的误解。爱德华·曼斯菲尔德（Edward Mansfield）和布莱恩·波林斯（Brian Pollins）认为经济交往可以增进不同国家私营部门以及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这种日益强化的互动交流反过来有助于塑造合作性的政治关系。[[33]](#footnote-33)

多鲁森和沃德强调贸易关系中的间接联系还可以通过日常交流、信息交换以及文化交往等方式降低冲突的发生。冲突中第三方出面调停的原因有三点：第三方有减少贸易损失的动机；第三方有途径与冲突双方会面，并获得它们各自的信息；第三方与冲突国的长期贸易往来使其更受信任。[[34]](#footnote-34)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入侵柬埔寨，战场上的僵局使交战双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作为第三方的中国为解决该问题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双边层面多次与越南和柬埔寨高层进行直接会谈，了解双方的主张和诉求。同时，中国还积极与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大国进行沟通，交换彼此的政策立场，寻求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行之道。此外，在联合国层面，中国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行了多轮磋商，最终达成了“五大国框架协定”，在此基础上最终推动了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如果两国与第三方贸易关系更紧密，它们与第三方的沟通交流就更密切，从而使这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低。

此外，在贸易网络中，国家之间由于贸易关系密切程度的差异可能形成不同的贸易集团。战争的负外部性主要作用于与冲突双方存在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例如，图2有三个贸易集团，冲突可能发生在集团内部和集团之间。就集团内的冲突而言，假设集团1中A、B发生冲突，由于A与D、E、F以及B与C、E、F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所以C、D、E、F会受到冲突的直接负外部性的冲击。就集团间的冲突而言，例如，E和H发生了冲突，E在集团1中B、D、F直接相连，所以冲突对其冲击最大。同样，冲突也会对集团2中的I、G造成直接冲击。

同时，由于贸易集团的规模和内部成员的关系强度并不一致，所以外部性的作用强度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在一个关系并不紧密的贸易集团中，国际冲突的发生对成员国贸易关系的影响可能并不强烈，因此它们干预冲突的动机也不高，外部性发挥的作用较弱。例如，如果图2中集团2 的H和I发生冲突，它只会对G、J和M造成直接影响，而对其他成员的影响并不大。如果在一个贸易关系十分紧密的贸易集团中，国际冲突会让成员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它们干预冲突的可能性就更高。例如，如果图2中集团1的A和F产生冲突，那么整个集团的所有成员都会受到冲突的直接冲击。因此，本文得出以下假设：

H*3*：在贸易关系比较紧密的集团中，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更低。在贸易关系比较松散的集团中，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并不确定。

图2 贸易网络的密度和战争的直接负外部性

N

G

A

F

M

H

E

B

I

L

K

J

D

C

集团1 集团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时间范围为2000-2014年，主要的原因是：其一，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冷战结束前，对新世纪以来贸易相互依赖与国际冲突的探究甚少。新世纪以来，随着贸易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度复杂化，贸易的和平效应是否进一步增强？间接的贸易依赖是否同样能够抑制冲突？其二，由于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中国际冲突的数据只包括2014年之前的数据，所以本研究未能获得2014年之后的相关数据。

（一）主要变量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主要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军事化争端”（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数据（4.02版）。该数据收录了1816年到2014年的国际冲突，每次国际冲突根据双方敌对程度赋值为1到5，其中5表示战争，4代表使用武力，3代表展示武力，2为威胁使用武力，1为未采取军事化行动。本文将使用国际冲突的严格定义：即使用武力及交战，其中4包括封锁、占领领土及进攻。在本文中，如果两国在一年中的敌对程度达到4、5，我们就认为它们发生了冲突，从而对其赋值为1。如果敌对程度为1、2、3，我们就赋值为0。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增加一种宽泛的国际冲突的定义，即展示武力、使用武力及交战。其中3包括决定动员、军队或船舶移动、侵犯边境或构筑边境防御工事。

核心自变量。本文有三个自变量，其中一个是第三方贸易，我们借鉴金恩的研究[[35]](#footnote-35)，设

为阶矩阵，的第行列元素为，且当时，即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均为0，记为的转置，第行列元素为

设矩阵，则为阶矩阵，第行列元素为:

当时，矩阵的第行列元素为0，即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均为0。

记矩阵为矩阵的二分矩阵，则为阶矩阵，第行列元素：

设矩阵,则矩阵为阶矩阵，第行列元素为:

设为阶矩阵，中第行列元素为：

当时，矩阵的第行列元素为0，即矩阵的主对角线元素均为0。

其中

第二个核心自变量是最大流，以检验上文中的假设二。Ford—Fulkerson算法是一种通过邻接矩阵求最大流的一种经典方法。在一个无向图中，若从顶点i到顶点j有路径相连，则称i和j是连通的。Ford—Fulkerson方法研究的是连通图中顶点间的最大流，因此在算法的实现应用中要将数据处理为连通图对应的数据就本文而言，要想变为连通的，剔除图中的孤立点即可，也就是贸易额为0的最大流是0。

第三个核心自变量是贸易集团。由于本文样本数目较大，若将数据源所有样本进行系统聚类，则在算法步骤的实现中将超出计算机计算内存，所以对于该数据，本实验需采用k-means聚类方法。将数据源中两国贸易的所有样本作为聚类对象，考虑到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因此将两个国家的GDP也纳入聚类属性中，进行k-means聚类。本实验中设置聚类数k=5，设置迭代次数为20进行实验。在本实验中，迭代18次后实现收敛，即聚类中心位置不再变化，于是跳出循环，完成分类。五个类别对应的聚类中心分别为9.033、17.120、18.902、19.493及19.453，其对应的样本量分别为249487、19948、5862、333和2883。以上数据均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贸易”数据（Trade 4.0版）。

控制变量。我们的模型控制了影响国际冲突发生的八个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是国家规模，其进一步分解为GDP和国家人口，根据通行做法将以上两个变量分别设置为高值和低值，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我们都对其取自然对数处理。第二个控制变量是地理距离。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两国相距越近，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越高。经验研究也表明邻国更可能爆发冲突。[[36]](#footnote-36)因此本文设置了两个变量：第一个是两国的首都距离的自然对数，第二个是直接接壤。如果两国毗邻或者水上距离小于150英里，则赋值为“1”，否则为“0”。以上地理距离数据均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第三个控制变量是政体类型。我们根据两国的政体得分，分别求出政体得分的高值与低值和国际冲突的关系，我们期待更加民主的国家发生国际冲突的次数越低。政体得分数据来自政体5（Polity Ⅴ）数据库，其赋值为-10到10，6分及以上为民主国家。

第四个控制变量是相对能力，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中的CINC即反映了一国占世界各国军事实力的比例，其中的赋值指标包括人口资源、工业能力、军事开支及人员规模等。[[37]](#footnote-37)我们用两国中CINC的高值除以低值来衡量相对能力。第五个控制变量是结盟，如果两国在某年存在盟友关系，我们将其赋值为“1”，否则为“0”，数据同样来自战争相关因素数据库。最后一个控制变量是大国[[38]](#footnote-38)，如果两国中至少有一国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我们就对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均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标准差 |
| 国际冲突 | 0.002 | 0.000 | 1.000 | 0.000 | 0.049 |
| 第三方贸易 | 0.221 | 0.177 | 0.927 | 0.004 | 0.151 |
| 贸易最大流量 | 7.426 | 7.451 | 8.254 | 5.159 | 0.364 |
| 贸易集团 | 3.986 | 4.000 | 5.000 | 1.000 | 0.652 |
| 贸易相互依赖 | 0.001 | 0.000 | 0.252 | 0.000 | 0.004 |
| GDP（高值） | 26.045 | 26.089 | 30.504 | 20.122 | 1.706 |
| GDP（低值） | 23.417 | 23.355 | 29.966 | 18.869 | 1.659 |
| 人口（高值） | 17.105 | 17.104 | 21.039 | 11.152 | 1.439 |
| 人口（低值） | 14.927 | 15.241 | 20.982 | 5.771 | 1.745 |
| 政体（高值） | 7.559 | 9.000 | 10.000 | -10.000 | 3.731 |
| 政体（低值） | 0.655 | 0.000 | 10.000 | -10.000 | 6.001 |
| 结盟 | 0.0957 | 0.000 | 1.000 | 0.000 | 0.294 |
| 首都距离 | 8.630 | 8.805 | 9.895 | 3.367 | 0.817 |
| 接壤 | 0.036 | 0.000 | 1.000 | 0.000 | 0.187 |
| 实力比 | 2.446 | 1.955 | 12.898 | 0.000 | 2.003 |
| 大国 | 0.077 | 0.000 | 1.000 | 0.000 | 0.267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二）模型设定

赫格的研究表明，引力模型可以作为预测国际冲突发生的一种合适的模型。由于国际冲突的发生是一个二值虚拟变量，所以我们可以运用的模型有Logit、Probit以及线性概率模型。线性概率模型并不能保证国际冲突出现的概率在0到1之间。Logit和Probit模型的区别在于Logit模型的随机误差项的分布服从logistic分布，而Probit中随机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由于2000-2014国际冲突的发生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太符合正态分布，所以我们选择Logit模型。模型形式分别为：

在进行相关性检查时，发现第三方贸易和贸易最大流量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分别对其进行检验。由于聚类结果共有5类，所以本文设置了4个虚拟变量。本文统计数据的总样本量为278513，该样本是2000-2014年195个国家和地区贸易的观察总数。但是，由于贸易额、GDP、政体、人口等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因此回归结果中的观察值为151026。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第三方贸易对国际冲突均有显著影响，且所有系数都为负，系数分别是-1.480、-1.464、-1.421和-1.261，这表明与第三方贸易越密切，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越小。这个结果支持假设1的推论。而贸易集团对国际冲突的影响比较复杂，其中前3个模型中贸易集团的系数均不显著，只有第4模型显著。这4模型中的贸易集团分别对应聚类中的类别1至类别4，其中类别4的聚类中心最大，类别1至类别3的聚类中心小于类别4。这说明在大多数贸易集团中，外部性机制对国际冲突的抑制作用并不确定。只有在极个别内部贸易关系十分密切的贸易集团中，外部性的影响才比较突出，可能会抑制冲突的发生。该发现初步验证了假设3。在控制变量中，我们所使用的奥尼尔和拉塞特对贸易相互依赖的测度强烈支持贸易和平论的观点。意外的是，政体高值、政体低值以及首都距离与预期相反，表明我们有理由质疑民主和平论的论断，同时也需要反思距离越远，冲突就越少的观点。此外，所有的模型均表明GDP较高的国家较少发生冲突，GDP较低的国家更可能发生冲突，但是我们的证据都不够有力。

表2 贸易关系中的第三方与国际冲突(2000-2014)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第三方贸易 | -1.480\*\*\*  （0.427） | -1.464\*\*\*  （0.425） | -1.421\*\*\*  （0.426） | -1.261\*\*\*  （0.431） |
| 贸易集团 | -0.094  （0.192） | 0.060  （0.145） | -0.274  （0.266） | -0.869\*\*\*  (0.332) |
| 贸易相互依赖 | -28.616\*\*\*  （7.353） | -28.184\*\*\*  （7.379） | -27.734\*\*\*  （7.403） | -26.214\*\*\*  （7.318） |
| GDP  （高值） | -0.058  （0.082） | -0.049  （0.078） | -0.041  （0.076） | -0.039  （0.076） |
| GDP  （低值） | 0.147\*  （0.082） | 0.143  （0.080） | 0.139\*  （0.080） | 0.117  （0.080） |
| 人口  （高值） | 0.495\*\*\*  （0.097） | 0.497\*\*\*  （0.097） | 0.512\*\*\*  （0.098） | 0.503\*\*\*  （0.097） |
| 人口  （低值） | 0.349\*\*\*  （0.096） | 0.349\*\*\*  （0.096） | 0.336\*\*\*  （0.097） | 0.376\*\*\*  （0.097） |
| 政体  （高值） | 0.061\*\*\*  （0.016） | 0.061\*\*\*  （0.016） | 0.061\*\*\*  （0.016） | 0.060\*\*\*  （0.016） |
| 政体  （低值） | -0.034\*\*\*  （0.011） | -0.035\*\*\*  （0.011） | -0.036\*\*\*  （0.011） | -0.041\*\*\*  （0.012） |
| 结盟 | 0.124  （0.134） | 0.127  （0.134） | 0.144  （0.135） | 0.075  （0.135） |
| 首都距离 | -0.675\*\*\*  （0.081） | -0.670\*\*\*  （0.082） | -0.660\*\*\*  （0.083） | -0.674\*\*\*  （0.081） |
| 接壤 | 2.944\*\*\*  （0.180） | 2.949\*\*\*  （0.181） | 2.946\*\*\*  （0.181） | 2.995\*\*\*  （0.181） |
| 实力比 | -0.280\*\*\*  （0.116） | -0.281\*\*  （0.116） | -0.292\*\*\*  （0.115） | -0.269\*\*\*  （0.116） |
| 大国 | 1.390\*\*\*  （0.183） | 1.408\*\*\*  （0.175） | 1.435\*\*\*  （0.173） | 1.454\*\*\*  （0.172） |
| 常数项 | -17.451 | -17.758 | -17.944 | -17.955 |
| 样本量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 Pseudo R2 | 0.370 | 0.370 | 0.370 | 0.372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2） \*p<0.1; \*\*p<0.05; \*\*\*p<0.01.

根据表3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贸易最大流量也对国际冲突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且所有系数都为负，系数分别是-0.798、-0.797、-0.779和-0.738，这表明两国与第三方的贸易关系越紧密，它们与第三方的沟通交流就更密切，相互理解的程度更高，这就会降低冲突的发生。这与本文的假设2一致。在表3中，贸易集团与国际冲突都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前3个模型中的贸易集团均不显著，只有第4模型显著。这和表2的结果比较一致，表明只有在贸易关系密切的集团内，国际冲突的可能性才会更低。

表3 贸易最大流量与国际冲突(2000-2014)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模型8 |
| 贸易最大流量 | -0.798\*\*\*  （0.331） | -0.797\*\*\*  （0.331） | -0.779\*\*\*  （0.331） | -0.738\*\*  （0.330） |
| 贸易集团 | -0.001  （0.192） | -0.042  （0.145） | -0.317  （0.264） | -0.993\*\*\*  (0.331) |
| 贸易相互依赖 | -32.613\*\*\*  （7.428） | -32.412\*\*\*  （7.457） | -31.627\*\*\*  （7.498） | -29.298\*\*\*  （7.402） |
| GDP  （高值） | -0.040  （0.081） | -0.044  （0.077） | -0.038  （0.076） | -0.038  （0.076） |
| GDP  （低值） | 0.177\*  （0.096） | 0.178\*  （0.096） | 0.175\*  （0.095） | 0.157  （0.095） |
| 人口  （高值） | 0.447\*\*\*  （0.096） | 0.447\*\*\*  （0.096） | 0.465\*\*\*  （0.096） | 0.459\*\*\*  （0.095） |
| 人口  （低值） | 0.356\*\*\*  （0.097） | 0.356\*\*\*  （0.097） | 0.339\*\*\*  （0.097） | 0.385\*\*\*  （0.098） |
| 政体  （高值） | 0.056\*\*\*  （0.016） | 0.056\*\*\*  （0.016） | 0.056\*\*\*  （0.016） | 0.056\*\*\*  （0.016） |
| 政体  （低值） | -0.037\*\*\*  （0.011） | -0.037\*\*\*  （0.011） | -0.038\*\*\*  （0.011） | -0.044\*\*\*  （0.011） |
| 结盟 | 0.131  （0.135） | 0.133  （0.135） | 0.152  （0.136） | 0.077  （0.136） |
| 首都距离 | -0.677\*\*\*  （0.082） | -0.674\*\*\*  （0.083） | -0.659\*\*\*  （0.083） | -0.678\*\*\*  （0.082） |
| 接壤 | 2.933\*\*\*  （0.181） | 2.937\*\*\*  （0.182） | 2.937\*\*\*  （0.182） | 2.989\*\*\*  （0.181） |
| 实力比 | -0.266\*\*  （0.115） | -0.263\*\*  （0.115） | -0.294\*\*\*  （0.182） | -0.248\*\*\*  （0.115） |
| 大国 | 1.360\*\*\*  （0.183） | 1.352\*\*\*  （0.174） | 1.378\*\*\*  （0.172） | 1.411\*\*\*  （0.171） |
| 常数项 | -12.299 | -12.256 | -12.595 | -13.043 |
| 样本量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 Pseudo R2 | 0.369 | 0.369 | 0.369 | 0.371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2） \*p<0.1; \*\*p<0.05; \*\*\*p<0.01.

（三）稳健性检验

表2和表3的基准回归支持我们的三个假设，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排除偶然性的影响，我们将进行三种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是将GDP数据替换为人均GDP数据，第二种我们用敌对程度为3、4、5的国际冲突替代基准回归中敌对程度为4、5作为因变量。此外，我们增加Poisson模型进行对照，它可以用于描述单位时间某事件发生的频数分布情况，通常用于描述稀有事件/小概率事件发生数的分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对贸易集团的考察中，只有类别4显著，所以本文只检验该变量的稳健性。可以看到，用人均GDP的数据替换并没有对自变量的显著性有明显影响，而且人均GDP对国际冲突的影响也不显著。在第二种显著性检验中，可以看到因变量的变化对贸易最大流量和贸易集团的影响并不大，两个核心自变量依然显著。此外，Poisson回归的结果与Logit的结果十分相近，两种模型均支持基准回归的结果。

表4 稳健性检验

|  |  |  |  |  |
| --- | --- | --- | --- | --- |
|  | 因变量；国际冲突（4、5） | | 因变量：国际冲突（3、4、5） | |
| Logit | Poisson | Logit | Poisson |
| 第三方贸易 | -0.931\*\*  (0.417) | -1.169\*\*\*  (0.382) |  |  |
| 贸易最大流量 |  |  | -0.738\*\*  (0.330) | -0.738\*\*  (0.350) |
| 贸易集团 | -0.943\*\*\*  （0.333） | -0.805\*\*\*  （0.288） | -0.993\*\*\*  （0.331） | -1.102\*\*\*  （0.376） |
| 贸易相互依赖 | -23.367\*\*\*  (7.146) | -20.796\*\*\*  （6.635） | -29.298\*\*\*  (7.402) | -32.197\*\*\*  (7.832) |
| GDP  （高值） |  |  | -0.038  （0.076） | -0.040  （0.078） |
| GDP  （低值） |  |  | 0.157  （0.095） | 0.169\*  （0.099） |
| 人均GDP  （高值） | 0.059  （0.057） | 0.064  （0.054） |  |  |
| 人均GDP  （低值） | -0.059  （0.072） | -0.038  （0.069） |  |  |
| 人口  （高值） | 0.557\*\*\*  (0.094) | 0.540\*\*\*  （0.088） | 0.459\*\*\*  (0.095) | 0.444\*\*\*  (0.101) |
| 人口  （低值） | 0.359\*\*\*  (0.092) | 0.316\*\*\*  （0.087） | 0.385\*\*\*  (0.098) | 0.401\*\*\*  (0.102) |
| 政体  （高值） | 0.058\*\*\*  (0.017) | 0.050\*\*\*  （0.016） | 0.056\*\*\*  (0.016) | 0.057\*\*\*  (0.017) |
| 政体  （低值） | -0.038\*\*\*  (0.012) | -0.050\*\*\*  （0.016） | -0.044\*\*\*  (0.012) | -0.047\*\*\*  (0.012) |
| 结盟 | 0.078  (0.136) | 0.078  （0.127） | 0.077  (0.136) | 0.141  (0.144) |
| 首都距离 | -0.665\*\*\*  (0.081) | -0.649\*\*\*  （0.077） | -0.678\*\*\*  (0.082) | -0.685\*\*\*  (0.087) |
| 接壤 | 3.038\*\*\*  (0.183) | 2.886\*\*\*  （0.178） | 2.989\*\*\*  (0.181) | 3.029\*\*\*  (0.188) |
| 实力比 | -0.358\*\*\*  (0.085) | -0.343\*\*\*  （0.081） | -0.248\*\*\*  (0.115) | -0.252\*\*\*  (0.119) |
| 大国 | 1.498\*\*\*  (0.172) | 1.393\*\*\*  （0.165） | 1.411\*\*\*  (0.171) | 1.580\*\*\*  (0.179) |
| 常数项 | -16.951 | -16.148 | -13.043 | -13.275 |
| 样本量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151026 |
| Pseudo  R2 | 0.372 | 0.371 | 0.371 | 0.371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2） \*p<0.1; \*\*p<0.05; \*\*\*p<0.01.

**五、案例检验**

本文选取欧盟与伊朗核协议签订、中国与东盟国家妥善处理南海争端、印尼与新加坡调停柏威夏寺冲突三个案例，以对假设分别进行验证。首先，作为第三方的欧盟与美国和伊朗经贸联系紧密，而美国与伊朗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经贸联系较少。其次，中国和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同属于中国—东盟贸易区成员，泰国、新加坡等非南海声索国则为第三方，且中国与声索国和非声索国贸易关系都很密切。最后，泰国、柬埔寨同为东盟成员，在泰国与柬埔寨柏威夏寺冲突中，印尼、新加坡等其他东盟国家为第三方。

（一）欧盟与伊朗核协议签订

伊朗核问题是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为满足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经济等需求，伊朗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展其核计划。两伊战争后，伊朗加快了其核计划的实施进程。2002年，美国披露伊朗已秘密建造两个可生产武器级铀和钚的核设施。此后，美国不断加大对伊制裁力度，要求伊朗终止核计划。小布什政府多次发表对伊动武言论，使得战争乌云长期笼罩在中东上空。但是，小布什政府的强硬政策并未使伊朗终止核计划。在小布什继任者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转变了对伊强硬政策，对伊采取强硬政策与对话并行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继续对伊朗施压，逼迫伊朗放弃核计划。

然而，与美国和伊朗贸易联系紧密的欧盟并未追随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政策，而是坚持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谈判推动伊朗放弃核计划。最终，欧盟与中国、俄罗斯等国一道推动了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尽管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但是欧盟依然坚持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那么，为何作为美国盟友的欧盟，未追随美国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武力威胁政策呢？推动欧盟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核心动力又是什么？

在此，基于前文所推导的假设1和假设2，下文将围绕机会成本机制和互动交流机制对欧盟介入伊朗核问题的动机进行解析，以检视贸易因素与欧盟推行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内在联系。

其一，欧盟需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畅通，以稳定其能源供应链。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区，该区域蕴含世界50%的石油储量。截至2020年，世界上约有三分之一的石油消费由中东地区提供，且该地区是欧盟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区域。[[39]](#footnote-39)而伊朗控制着中东地区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直接影响着欧盟的能源利益。同时，欧盟长期以来是伊朗重要的贸易伙伴。欧盟出口的机械、运输设备、制成品和化学品占伊朗进口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伊朗对欧洲出口则占伊朗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石油及相关制品。由于伊朗天然气储量丰富，欧盟也将伊朗作为重要的能源替代供应地，以减轻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从原油进口量看，自1995年开始，欧盟平均每天从伊朗进口70万桶左右原油，占欧盟能源进口总量的5%—6%左右。[[40]](#footnote-40)2011年，欧盟成为伊朗第一大石油出口地，当年从伊朗进口的石油总量占欧盟能源进口总量上升到10%以上。在欧盟成员国中，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是伊朗石油的主要买家，其中意大利、西班牙从伊朗进口的石油量占欧盟从伊石油进口总量的70%。[[41]](#footnote-41)同时，欧盟对伊朗出口额长期位居伊朗进口总额的前两名。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前4个月伊朗与欧盟的贸易额为16.72亿欧元，其中伊朗向欧盟出口商品3.62亿欧元，同比增长37%，从欧盟进口商品13.1亿欧元，同比增长10%。[[42]](#footnote-42)

贸易往来使欧盟和伊朗都能从中获益，而冲突与威胁将会破坏正常的贸易模式。一旦发生冲突，中东地区石油出口量将大幅度下降，伊朗甚至可能直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直接导致欧盟能源危机。而从伊朗进口石油的西班牙、希腊等地中海国家将受到更严重的冲击。由于欧盟成员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性强，西班牙等国的石油危机将影响整个欧盟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对欧盟经贸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显然，伊朗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将大幅提高欧盟的经济成本，这种潜在的经济成本使欧盟避免使用武力解决伊朗核问题。

其二，如果美国与伊朗发生冲突，将影响欧盟与美国的贸易往来。欧盟与美国、伊朗之间的贸易链条符合假设1中图1 b 供应链机制，即伊朗从中东进口能源等原材料，然后将制造的商品出口美国。从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往来看，美国与欧盟长期以来互为彼此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双边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GDP总和的40%以上，商品和服务贸易额占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的40%以上。[[43]](#footnote-43)仅2010年至2019年，美国与欧盟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平均每年增长5%左右。[[44]](#footnote-44)2021年，欧盟是美国第三大商品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地。[[45]](#footnote-45)其中，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主要商品为药品、机械、车辆、光学和医疗器械，而药品、机械等出口商品离不开石油等原材料支撑。从国家来看，德国、法国长期位列欧盟27国对美进出口前五位。以2019年为例，德国、爱尔兰、法国、意大利和荷兰为美国前五大供应商。德国、荷兰、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为美国对欧盟前五大出口市场。[[46]](#footnote-46)不难看出，一方面，一旦对伊动武，不仅影响欧盟能源供应，也将影响美欧贸易，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与美国的贸易往来。

其三，欧盟坚持以外交手段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促使伊朗放弃核计划。与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军事打击以及全方位制裁等手段不同，欧盟坚持核问题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和对话予以解决。早在1998年全面对话机制建立开始，以德国、法国、英国为主要代表的欧盟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助推伊朗逐步放弃核计划。不仅如此，2006年至2014年间，在欧盟的推动下，美、英、法、俄、中、德六国以及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就伊核问题与伊朗进行了8次对话会，旨在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内贾德政府上台后，伊朗政府在和问题上坚持强硬政策，欧盟在推动对话的同时，强化了以贸易制裁与金融制裁为核心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旨在改变伊朗政府立场，而非惩罚伊朗。从制裁过程来看，欧盟对伊朗制裁主要经历了制裁与伊朗核项目有关的个人和组织、禁止欧盟成员国参与和伊朗石油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禁止欧盟成员国进口伊朗的原油以及石油制品共三个阶段，制裁措施在2012年达到顶峰。通过经济制裁，欧盟实现了对伊朗能源部门的精准打击，使伊朗经济遭受重创，也达到了促使伊朗调整核政策的目的。[[47]](#footnote-47)2013年，接替强硬派总统内贾德（Ahmadi Nejad）的哈桑·鲁哈尼（Hassan Rohani）上台后，伊朗核政策更加灵活而务实。随后，伊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并在当年11月达成议《联合行动计划》(Joint Plan of Action)。最终，伊朗与美俄中等六国达成《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简称《伊核协议》），从而使伊核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二）中国与南海声索国妥善处理南海争端

南海问题是中国—东盟关系健康发展必须面对的议题。作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地带”，南海是重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也是中国的贸易生命线。中国每年约80%的能源进口和超过65%的海上贸易通过南中国海过境。[[48]](#footnote-48)随着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南海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同时，南海蕴含着丰富的油气和矿产资源以及海产品，其中石油10.23亿吨，天然气储量超过3000万亿立方米，并含有锰、铁、铜、钴等多种矿产资源。[[49]](#footnote-49)

然而，围绕南海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和海上通道的争端由来已久，地缘政治局势时而剑拔弩张。一是中国与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产生领土争端、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争端等问题长期扰动地区局势。近年来，中国渔政船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在南海多次形成对峙。同时，2013年1月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单方面启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 将南海争端提交所谓的国际法庭仲裁，加剧了南海局势紧张。[[50]](#footnote-50)二是南海日益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战场”。近年来，美国先后实行“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在南海争议问题上的立场已经逐步从“相对中立”到“选边站”，直至“直接介入”，其政策着力点也已经从原来的管控争议、利用争议，演变为制造争议和鼓励摩擦。[[51]](#footnote-51) 不仅如此，美国加大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部署，深化亚太同盟网络，在南海继续维系着高强度的对华抵近侦察、穿越台湾海峡、前沿存在、战略威慑、“航行自由行动”、演习演训和战场建设等动作。日本、印度、英国、法国等其他域外国家也介入南海争端，导致局势更加复杂。

南海复杂的局势使得军事摩擦甚至大规模军事冲突风险不断上升，引发世界关注。但是，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努力下，南海局势虽局部偶有强烈动荡，但总体稳定可控。那么，美国支持下的南海声索国为何未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呢？促进南海局势稳中向好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不断升级，“经济红利”惠及双方。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和长期友好关系，中国与东盟近三十年来经贸往来产生了巨大的“经济红利”。双方贸易额从1991至2020年间由79.6亿美元增长到6846亿美元，年均增长16.5%。2009年以来，中国连续12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年，东盟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尽管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中国与东盟2020年双边贸易依然增长了6.7%，显示出极强的韧性。2021年前11个月，双方贸易额7895.3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在投资基建方面，自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印尼访问期间宣布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建设项目分别增长了85%和33%，其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得到的中国直接投资最多。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启动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为中国—东盟经贸发展注入新动力。

1. 非声索国积极协调，推动有关各方和平解决争端。担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为契机，泰国、新加坡积极推进。泰国从 2012年7月至2015年8月担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在此期间，菲律宾单方面启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泰国一方面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参与的多边外交场合创造探讨南海议题的机会，强化中国与声索国之间的互动。在2013 年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的高层论坛上，主办方泰国安排了《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议程》，为各方提供沟通机会。另一方面，泰国在东盟内部推动中国—东盟合作，以合作弥合中国与声索国之间的裂缝。2014年11月，在第17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泰国总理巴育进一步提出推动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三个主要领域，即通过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加强区域内全方位的互联互通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来强化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其中，南海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只是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灵活的外交议程设置，泰国不仅向中国传达了东盟与中国就南海问题展开对话的意愿，也在东盟内部明确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重要性及南海问题的定位。[[52]](#footnote-52)

新加坡在2015年8月至2018年8月间担任东盟对华关系协调国。一方面，新加坡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东盟的海洋安全合作来加强区域国家间的互信。2016 年，新加坡协调并推动中国与包括南海声索国的东盟国家签署《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CUES) ，并决定建立“中国和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另一方面，新加坡将协调工作的重心放在了维护东盟的团结上，并保持与中国在“仲裁案”问题上的沟通。虽然新加坡未能促成东盟国家达成共识，但它的协调使得东盟国家一致同意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克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保持稳定。[[53]](#footnote-53)

第三，非声索国推动声索国转变争端解决思维，避免卷入大国博弈。2009年以后，美国通过加强在亚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中的存在，企图通过强化与东盟国家合作对中国进行打压。泰国、老挝、缅甸等非南海主权的声索国多次表示，南海争端应当遵循和平和对话方式解决，南海争端不应成为中国－东盟开展战略合作的障碍。[[54]](#footnote-54)缅甸支持南海争端在东盟范围内达成共识。[[55]](#footnote-55)新加坡则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应符合国际法，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56]](#footnote-56)

在非声索国的呼吁下，声索国对美国介入持谨慎态度。例如，越南担心美国对南海事务过多介入而借机对其发动“和平演变”。印度尼西亚虽然对与美国合作持积极态度,但其目的在于增强自身能力，维护海洋安全，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57]](#footnote-57) 菲律宾则与中国重新建立起有效管控双方海上争端的模式，中菲虽仍不时因岛礁管控、渔业资源开发问题发生摩擦，但彼此矛盾和分歧得到有效管控，两国间海上局势总体稳定。[[58]](#footnote-58)从当前看，南海周边国家集中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没有变，保持南海和平稳定的总体愿望没有变，因此，维护南海安宁仍然指日可待。[[59]](#footnote-59)

（三）泰国与柬埔寨柏威夏寺冲突调停

泰国与柬埔寨的领土争端由来已久，1959年柬泰双方都宣称对柏威夏寺（Preah Vihear temple）及其周围区域享有领土主权，继而引起了双方的冲突。1962年国际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T）裁定柏威夏寺属于柬埔寨，柬泰冲突暂时平息。然而，2008年在该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确立为世界遗产保护区后，两国烽烟又起。

从2008年双方冲突再次爆发至今，两国就柏威夏寺的争端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为2008年7月15日至9月。在该阶段，柬泰双方都将军队调集到争议地区，双方进而呈对峙状态。2008年7月15日，3名泰国抗议者穿越柬泰边境检查站，试图接近柏威夏寺并将泰国国旗插上该寺而遭到柬埔寨当局拘捕。虽然这几名抗议者很快就被柬方释放，但双方在边境地区集结了约500名泰国军人和1000名柬埔寨军人，双方形成对峙局面。[[60]](#footnote-60)2008年10月3日至11月中旬为柬泰冲突的第二阶段。在此期间，双方冲突明显升级。10月3日，柬泰两国军队在柏威夏寺附近有争议地区发生交火。10月14日，两国军队再次发生交火，造成泰军7人受伤，柬军则3死2伤。[[61]](#footnote-61)10月24日，双方领导人在亚欧峰会上一致同意搁置地区冲突。2009年1月，双方同时从柏威夏寺及附近地区撤军。柬泰冲突第三阶段发生在2011年2月至4月。2月4日至7日，双方军队在柏威夏寺周边地区再次发生冲突，两国甚至动用了火炮和火箭炮等重型武器。5日和6日，两军举行了两轮会谈，双方初步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在会议结束后的次日，双方再次兵戎相见。7日，柬政府表示，柬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绝不退让，同时将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应对泰军的挑衅。4月22日起，两国在边境地区又一次爆发了为期10天的武装冲突，造成18人死亡。[[62]](#footnote-62)

2008年 7 月 20 日，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外长杨荣文发表声明表示，希望柬泰两国能够通过双边会谈，找到一个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途径，并表示愿意为柬泰两国解决争端提供合适的会谈场所。2011 年柬泰边境再起冲突，时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受东盟委托前往柬泰两国展开斡旋。但是新加坡和印尼的调停并未奏效，不久后柬泰又起冲突。与此同时，东盟其他成员国虽然多次表示关注，但是未采取实质行动。为何在泰国与柬埔寨柏威夏寺爆发冲突期间，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调停无效？东盟其他成员为何置身事外？

其一，从贸易规模看，东盟内部贸易规模较小。2015年，东盟成员国内部进出口贸易额5454.1亿美元，占东盟国际贸易总额的24%；其中成员国间出口3060.9亿美元，占国际贸易出口总额的25.8%；进口2393.2亿美元，占国际贸易进口总额的21.9%。[[63]](#footnote-63)2020年，东盟成员国内部进出口贸易额5658.9亿美元，占东盟国际贸易总额的21.3%；其中成员国间出口2980.9亿美元，占东盟国际贸易出口总额的21.4%；进口2678.0亿美元，占东盟国际贸易进口总额的21.1%。[[64]](#footnote-64)

其二，从进出口贸易结构看，东盟内部贸易中商品和服务贸易发展不平衡。在商品贸易方面，电气设备、锅炉、矿物燃料长期位居东盟内部贸易前三位。[[65]](#footnote-65)柬埔寨和泰国以农业为主，电气设备等大宗商品种类所占比重较低，因而与东盟其他国家的联系较弱。在商品贸易方面，新加坡长期占东盟服务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文莱、柬埔寨、老挝及缅甸合计仅占2.1%。此外，从产业结构看，除新加坡以半导体、计算机设备等电子工业外，其他东盟国家主要以农业、采矿业为主，产业结构同质化程度较高也成为东盟贸易联系进一步深化的障碍之一。

正是由于东盟国家产业结构趋同、贸易联系较弱，因此柬泰争端对其他东盟国家的贸易影响较弱，这些国家就缺乏采取有力行动的决心和介入争端的动机。以和泰国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马来西亚为例，2011年2月至4月柬泰争端期间，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并未受到明显的影响。事实上，2011年2月至3月其出口额由约1138亿美元上涨至约1420亿美元，涨幅达24.78%；进口由约892亿美元上涨至约1151亿美元，涨幅达29.03%。[[66]](#footnote-66)同样东盟中越南的柬埔寨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然而柬泰争端也未对泰国造成经贸损失。2011年2月至3月泰国出口分别由48.48亿美元上涨至74.47亿美元，涨幅达53.60%；进口额由59.6亿美元上涨至88.56亿美元，涨幅达48.59%。[[67]](#footnote-67)最终，国际法院强力介入，裁决柏威夏寺归属柬埔寨，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

总结上述案例可验证本文的三个假设:一是欧盟与伊朗和美国贸易联系紧密，一旦美伊发生大规模冲突，不仅对欧盟能源供应构成巨大威胁，也将对欧盟与美国贸易造成不利影响，因而成本机制、沟通机制为欧盟提供了斡旋动机。从互动交流机制看，欧盟对伊朗的实施的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成功地将伊朗拉回谈判桌前，且欧盟从中沟通协调获得了美伊双方信任。二是中国与南海声索国同为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员，双方经贸联系紧密。一旦南海发生大规模冲突，对双方经济都会造成较大损失。东盟作为重要的地区组织，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主张通过和平与对话的方式解决南海争端，避免卷入大国博弈。三是柬泰都属于东盟国家，然而由于该集团内部的贸易联系不够密切，两国争端对东盟其他成员的影响有限，这些成员没有强有力的调停冲突的动机和决心，从而使冲突持续蔓延。

**六 结论**

贸易依赖中的第三方是如何引起/抑制国际冲突的？本文从网络分析视角系统检验了机会成本机制、互动交流机制和外部性机制，发现更紧密的第三方贸易及互动交流会降低国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外部性只有在贸易关系较为密切的集团才会发挥较大作用，从而抑制冲突。此外，案例研究以伊核协议签订为例说明了机会成本和互动交流机制的作用，以南海争端和柬泰冲突验证了不同密度的贸易集团中外部性的作用效果。

本文有三点贡献：首先，本文对贸易和平论进行了拓展，较为系统地检验了贸易中的第三方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机制。其次，本文揭示出外部性作用机制具有异质性，只有在关系较为密切的贸易集团中，外部性的作用才较为显著。而在关系并不紧密的贸易集团中，外部性机制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同时，我们采用定量和过程追踪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有助于克服既有文献偏重定量检验的倾向，补充微观层面的证据，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当然本文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贸易集团的识别还可以使用其他的方法，从而有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研究结论。同时，个别案例的选取可能代表性较弱，不能充分说明文章中的假设。今后的研究可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研究发现，战争和冲突很容易复发，因此，机会成本、互动交流及外部性机制能否有助于降低战争的复发？其次，在联盟、恐怖组织等国际关系的其他网络关系中是否广泛存在以上机制？以上问题都可以进一步探究。

**Third Par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n Trade Interdependence**

**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le insufficient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rd parties.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mechanisms: opportunity cost, interactive exchange and externality, and shows through empirical tests that the closer the trad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 with a third party, the less like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externalities are heterogeneous, and the likelihood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s lower only in blocs with closer trade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aking the signing of the EU-Iran nuclear deal, the proper handl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and the mediation of Indonesia and Singapore in the Preah Vihear conflict as examples,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 EU's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US-Iran nuclear talks under the role of opportunity costs and interactive exchange mechanisms has prevented conflicts from worsening or ev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in the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where trade relations are close, and the parti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have been prevented from worsening or even getting out of control with the intervention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FTA; In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where trade ties are loose, other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have not effectively mediated their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ailand and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in Cambodia.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trade peace theory, which can further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role of indirect relations and its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s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Key Words**: trade peace theory, third party, opportunity cost, interactive exchange, externality

1. 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24, No.1, 1980, pp. 55-78. [↑](#footnote-ref-1)
2.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1, No.2, 1997, pp. 267-293. [↑](#footnote-ref-2)
3. Håvard Hegre,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Trade Does Promote Peace: New Simultaneous Estimates of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6, 2010, pp. 763-774.更多相关研究参见Erik Gartzke, and Li Quan, “Measure for Measure: 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0, No.5, 2003, pp. 553-571; Rafael Reuveny, and Kang Heejoon,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tical Conflict/Cooperation, and Granger Caus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0, No.3, 1996, pp. 943-970; Zeev Maoz,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on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cross Levels of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3, No.1, 2009, pp. 223-240;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2010, pp. 29-42; 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30-155页；邝艳湘，向洪金：《贸易与国际冲突的因果检验》，《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2期，第1-26页；邝艳湘：《国际贸易和平效应的演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第81-93页。 [↑](#footnote-ref-3)
4.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pp. 267-293; John R. Oneal, and Bruce Russett, “Assessing the Liberal Peace with Alternative Specifications: Trade Still Reduces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 423-442. [↑](#footnote-ref-4)
5. 参见Havard Hegre, “Development and the Liberal Peace: What Does It Take to Be a Trading Stat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7, No.1, 2000, pp. 5-30. 赫格在这里强调发展水平而未直接强调民主制，但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西式民主制国家。Solomon W. Polachek, and Carlos Seiglie, “Trade, Peace and Democracy: An Analysis of Dyadic Dispute.” *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 Vol.2, 2007, pp. 1017-1073; Christopher F.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Sources of the Liberal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5, No.1, 2008, pp. 17-36; Michael Mousseau, “The Social Market Roots of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4, 2009, pp. 52-86. [↑](#footnote-ref-5)
6.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A Theory of Trade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4, 1996, pp. 5-41. [↑](#footnote-ref-6)
7.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9. [↑](#footnote-ref-7)
8. Edward D. Mansfield, and Jon C. Pevehouse, “Trade Blocs, Trade Flow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4, No.4, 2000, pp. 775-808. [↑](#footnote-ref-8)
9. Katherine Barbieri,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 Path to Peace or a Source of Interstate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3, No.1, 1996, pp. 29-49. [↑](#footnote-ref-9)
10. 虽然两种测度方法不同，但是相关研究表明巴比里使用的贸易份额测度方法与奥尼尔和拉塞特的贸易开放性测度呈负相关关系。参见Erik Gartzke, and Li Quan, “Measure for Measure: 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pp. 553-571. [↑](#footnote-ref-10)
11. Solomon W. Polachek, and Judith McDonald, “Strategic Trade and the Incentive for Cooperation.” *Disarmament, Economic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of Peace*, New York: Praeger, 1992, pp. 273-284. [↑](#footnote-ref-11)
12. Jon C. Pevehouse, “Interdependence Theory and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6, No.1, 2004, pp. 247-266. [↑](#footnote-ref-12)
13. Mark J.C.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5, No.3, 2003, pp. 809-832. [↑](#footnote-ref-13)
14. Frederick R. Chen, “Extended Dependence: Trade, Alliances, and Pea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3, No.1 ,2021, pp. 246-259. [↑](#footnote-ref-14)
15. Yuan-Ching Cha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Impact of Third-Party Trade on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0, No.2, 2005, pp. 207-232. [↑](#footnote-ref-15)
16. Kinne, Brandon J, “Does Third-Party Trade Reduce Conflict? Credible Signaling Versus Opportunity Cost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31, No.1, 2014, pp. 28-48. [↑](#footnote-ref-16)
17.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pp. 8-9. [↑](#footnote-ref-17)
18. Ibid. [↑](#footnote-ref-18)
19. 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A.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7, No.6, 2013, pp. 1011-1042. [↑](#footnote-ref-19)
20. Feldman, Nizan, and Tal Sadeh, “War and Third-Party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62, No.1, 2018, pp. 119-142; Peterson, Timothy M, “Third-Party Trade, Political Similarity, and Dyadic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8, No.2, 2011, pp. 185-200. [↑](#footnote-ref-20)
21. Yuan-Ching Cha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Impact of Third-Party Trade on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40, No.2, 2005, pp. 207-232. [↑](#footnote-ref-21)
22.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47, No.1, 2010, pp. 29-42; Dotan A. Haim, “Alliance Networks and Trade: The Effect of Indirect Political Alliances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3, No.3, 2016, pp. 472-490. [↑](#footnote-ref-22)
23. Renato Corbetta, “Cooperative and Antagonistic Networks: Multidimensional Affinity and Intervention in Ongoing Conflicts, 1946–2001.”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2, 2013, pp. 370–384. [↑](#footnote-ref-23)
24. Solomo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pp. 55-78. 更多相关研究参见：Polachek, Solomon W., John Robst, and Yuan-Ching Chang, “Liberalism and Interdependence: Extending the Trade-Conflict Model.”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36, No.4, 1999, pp. 405-422;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pp. 267-293; Mark J.C. Crescenzi, “Economic Exit,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pp. 809-832. Timothy M. Peterson, “Dyadic Trade, Exit Costs,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58, No.4, 2014, pp. 564-591. [↑](#footnote-ref-24)
25.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9-832页。 [↑](#footnote-ref-25)
26. Michael J. Hiscox, “Trade, Distribution, and Factor Mobili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Political Conflic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footnote-ref-26)
27. 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A.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1011-1042. [↑](#footnote-ref-27)
28. 本段论述来自卢普和特拉格的研究，详见Yonatan Lupu, and Vincent A. Traag, “Trading Communities, the Networke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1011-1042. [↑](#footnote-ref-28)
29. David Ricardo, *The Works of David Ricardo, Vol I.* Ed. Pierro St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Cited from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29-42. [↑](#footnote-ref-29)
30. Karl Deutsch, et al, *Political Community and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Cited from Patrick J. McDonald, “Peace Through Trade or Free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8, No.4, 2004, pp. 547-572. [↑](#footnote-ref-30)
31. John R. Oneal, and Bruce M. Russet, “The Classical Liberals Were Right: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1950–1985.” p. 270. [↑](#footnote-ref-31)
32. Ewan Harrison, “*Reassessing the Logic of Anarchy: Rationality Versus Reflexivity*. Working Paper. 2000. [↑](#footnote-ref-32)
33. Edward D. Mansfield, Brian M. Pollins, “The Study of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Recent Advances, Open Ques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5, No.6, 2001, pp. 834-859. [↑](#footnote-ref-33)
34. Han Dorussen, and Hugh Ward, “Trade Networks and the Kantian Peace.” pp. 29-42. [↑](#footnote-ref-34)
35. 详见Kinne, Brandon J, “Does Third-Party Trade Reduce Conflict? Credible Signaling Versus Opportunity Costs.”  pp. 28-48. [↑](#footnote-ref-35)
36. Stuart A. Bremer, “Dangerous Dyads: Conditions Affecting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War, 1816-1965.”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6, No.2, 1992, pp. 309-341. [↑](#footnote-ref-36)
37. Michael Grieg, and Andrew Enterline,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NMC) Data Documentation (Version 6.0). *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 2021, pp. 1-81. [↑](#footnote-ref-37)
38. 多项研究均表明，大国更可能引起国际冲突。参见Erik Gartzke, and Li Quan, “Measure for Measure: Concept Operationalization and the Trade Interdependence-Conflict Debate.’’ pp. 553-571; Yuan-Ching Cha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Impact of Third-Party Trade on Political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p. 207-232; Christopher F. Gelpi, and Joseph M. Grieco,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Sources of the Liberal Peace.” pp. 17-36; 韩真，张春满：《商业和平论：一个理论批评》，第130-155页。 [↑](#footnote-ref-38)
39. Amna Puri-Mirza, “Crude oil industry in the GCC - statistics & facts”, Jun 14,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4546/gcc-crude-oil-industry/#topicHeader\_\_wrapper，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39)
40. IEEJ, “Recent trends in oil supply form Iran”, Jun, 2012, <https://eneken.ieej.or.jp/data/4363.pdf>, p. 14. [↑](#footnote-ref-40)
41. 吕蕊、赵建明：《试析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中的角色变化与影响》，《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37-56页。 [↑](#footnote-ref-41)
42. 商务部：《伊朗对欧盟出口同比增长37%》，<http://i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2206/20220603320

    622.shtm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42)
43. European Commission,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acts, figure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united-states\_en，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43)
44.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EU Trade Relations”, June 3, 2022, pp. 1-3. [↑](#footnote-ref-44)
45. Ibid. [↑](#footnote-ref-45)
46.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europe-middle-east/europe/european-union, 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46)
47. 吕蕊、赵建明：《试析欧盟在伊朗核问题中的角色变化与影响》，《欧洲研究》，2016年第6期，第37-56页。 [↑](#footnote-ref-47)
4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论中国海上油气通道安全》，<http://www.scio.gov.cn/m/372>59/document/1596338/1596338.htm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48)
49. 中国南海网：《南海资源环境》，http://www.thesouthchinasea.org.cn/natural.htm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49)
50. 冯梁：《南海战略形势: 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第61-63页。 [↑](#footnote-ref-50)
51. 胡波：《当前南海局势的影响因素与走向分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2期，第67页。 [↑](#footnote-ref-51)
52. 贺嘉洁：《协调国机制与东盟对外关系——以东盟协调国应对南海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2期，第42-48页。 [↑](#footnote-ref-52)
53. 贺嘉洁：《协调国机制与东盟对外关系——以东盟协调国应对南海问题为例》，第42-48页。 [↑](#footnote-ref-53)
54. 周喜梅、梁霞：《泰国高层对南海争端的看法》，《南洋问题研究》，2013年第3期，第92-95页。 [↑](#footnote-ref-54)
55. Jeremie P. Credo, “Myanmar's ASEAN Leadership: Progres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Sept，2014，<https://fsi.gov.ph/myanmars-asean-leadership-progress-on-the-south-china-sea-by-jeremie-credo-issue-7-september-2014/>，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55)
56. 新加坡总理办公室：《李显龙总理在中央党校的讲话》，2012 年9月6日，https://www.pmo.gov.sg/Newsroom/speech-prime-minister-lee-hsien-loong-central-party-school-english-translation，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56)
57. Scott W. Harold, *The Thickening Web of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Deepening Defense Ties Among U. 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2019, p. 247. [↑](#footnote-ref-57)
58. 陈相秒：《菲律宾新政府南海政策将“稳”字当头》，https://brgg.fudan.edu.cn/articleinfo\_5013.html，访问时间：2022年8月1日。 [↑](#footnote-ref-58)
59. 冯梁：《南海战略形势: 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向》，《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3期，第64页。 [↑](#footnote-ref-59)
60. 武传兵、陈彬：《柏威夏寺成功申遗引发柬泰领土争端再度升温》，《当代世界》，2008年第9期，第26-27页。 [↑](#footnote-ref-60)
61. 邵建平：《柬泰柏威夏寺及其附近领土争端透析》，《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第49-54页。 [↑](#footnote-ref-61)
62. 王传军、付志刚：《东盟峰会调停泰柬冲突》，《光明日报》，2011年5月9日，第8版。 [↑](#footnote-ref-62)
63.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25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盟（2017年版），第37页。 [↑](#footnote-ref-63)
64. 同上，第27页。 [↑](#footnote-ref-64)
65. 参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主编：《25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盟（2017年版）》。 [↑](#footnote-ref-65)
66.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日。 [↑](#footnote-ref-66)
67.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访问时间：2022年12月2日。 [↑](#footnote-ref-67)